

目 录

回忆在华北联大的战斗生涯	胡 沙	(1)
华北联大文艺活动记事	梁化群	(25)
华北联大在张家口	桑 平	(32)
艾青在张家口	周红兴	(36)
丁玲与温泉屯	刘 蔚	(45)
飞到山城的一只春燕		
——革命作家蒋光慈在张家口的一段经历	董彩明	(48)
郭老率全国文联参观团张北之行纪实	左 璞	(50)
我的老师——陈企霞同志	桑 平	(56)
歌剧《白毛女》在张家口	舒 强	(60)
察哈尔省文工团的前前后后	阎小千	(63)
* * *		
张家口地区教育工作的开拓者		
——原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李舜琴二三事	桑 平	(73)
方白——忠实于人民的文化战士	晓青 晓钟	(78)
深切地怀念武树藩老校长	刘占山	(94)
深切怀念郅寒雨同志	张惠生 张琦 李铁	(102)
回忆我的父亲宋恩普	宋少普	(106)
回忆吕复视察涿鹿高小	阎自明	(111)
为阳原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宋凤歧	薛效铮	(114)
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教育家李泰棻先生的		
生平梗概	李蔼棻	(116)

洋河岸边桃李园——河北柴师崔志新 (249)

* * *

记三十年代中期的察哈尔蒙古图书编译馆李沛泽 (252)

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前后图书出版发行工作

 概况马凌光 (260)

张家口市图书馆的今昔董毅之 张振明 (264)

张家口版晋察冀边区邮票发行概况马凌光 (267)

回忆先父——著名老中医胡东樵胡玉琴 (270)

老中医张子善先生的生平事迹张一成 (274)

回忆在华北联大的战斗生涯

胡 沙

一、我在革命大学当戏剧教员

从一九四六年我在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员起，到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任教员止，我度过了七年解放区的新式革命大学的教学生活。

这种革命大学，当时吸引了解放区内外大批革命知识青年，培养了许多的革命人才。不但有力地支援了战争，也为全国的解放准备了一大批干部。

这所大学名叫做华北联合大学，革命教育家成仿吾任校长。他已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多年，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，或在这所学校任过教，或在这所学校受过教，都和这所学校有着亲密的关系。

我一九四五年从延安随艾青、江丰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到达张家口之后，就害了伤寒病，住在张家口铁路医院，差一点死去。等我病渐好，戏剧家马健翎同志（他也在这所新建立的学院临时担任行政工作）到医院看望我，并告诉我成立了华北联大艺术学院，组织上决定叫我到艺术学院戏剧系当教员。我听了之后，吃了一惊。我当时才二十四岁，虽说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就参加戏剧工作，在延安还参加了秧歌运动，但自知才疏学浅，怎能担当大学的教员呢？但我也没有表示反对，既然组织决定了，只能服从分配。病好后，我也就硬着头皮到了戏剧系。

当时联大由成仿吾任校长，张如心任教务长，下面分三个学院：就是以于力为院长的教育学院；以何干之为院长的政治学院；以沙可夫为院长、艾青为副院长的文艺学院。学校还附属了一个以周巍峙为团长、牧虹为副团长，王昆、陈强、邱力、李波为主演的，贺敬之为作家的华北联大文艺工作团。当时在张家口曾演出了大型歌剧《白毛女》。

文艺学院中分五个系。就是以陈企霞为系主任的文学系，教员有肖殷、何洛、严辰、蔡其矫等人，学生有李光耀、任大心、李晓白等人。他们现在都是有名的作家了。音乐系系主任是李焕之，教员有李元庆、李群等。

美术系系主任是江丰，教员有蔡若虹、马达、古元、罗工柳等。戏剧系的主任是舒强，教员有凌子风、石联星、逮斐、岳慎、洪涛和我。到冀中解放区后，贾克、王昆、郭兰英、赵莹、桑夫、马坚等同志都曾在戏剧系工作过。

还有一个舞蹈系，系主任是吴晓邦，学生只有一个谢坤。这师生二人到时候就光着腿赤着脚上课。

当时的这种革命大学，受战争的影响极大。当时联大的招生对象，主要是张家口解放后投奔革命的进步青年。例如北京青年，多数是通过青龙桥封锁线进入平西解放区的，由刘仁同志领导的城市工作部的同志接待他们，并把他们送到张家口。其中的大部分，就进入了华北联大。喜欢教育的就进教育学院，喜欢政治的就进政治学院，喜欢文艺的就进文艺学院。大量的革命青年进入了政治学院，少量的进入了文艺学院。当时文艺学院的每个系，也只有二三十个学生。入学也有考试手续，不过很简单，主要看学生适不适合向这方面发展，实际文化程度如何？因为这些学生都是经过了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解放区的，而且多数原来就和我们的地下组织有些联系，所以我们对这些青年，采用了“来者不拒，热烈欢迎”的方针。当时，我们的革命还是处于困

难时期，所以对于外来的知识青年，都视为革命的宝贵财富，认为他们是我们干部的后备队伍。华北联大，就在华北地区担当了为革命培养、教育青年的任务。

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就办在张家口的东山坡。在一座山脚下，旁边是一条河，到张家口市要通过一个石桥。在一座院墙内有四排红色的日本式房子，每一座房子都不大，分里外两间，外面有十来米，里面有八九米，地上铺着日本的草垫子，日本人叫“塔塔米”，有地板。另有一间小厨房，还有一间极小的放着一个大浴盆的洗澡间，洗澡就在大盆里面。所有的房子构造都是一个样儿。整整齐齐，排房之间有石子甬道。房屋旁边有低矮的树木，多是小槐树之类。院长沙可夫和副院长艾青及马雷等人住在第一排。系主任们住在第二排。院长和副院长及系主任住一套房子。教员一人住一间房子，学生们一个小组住一间房子。每个小组七八个人，住在一处。

学生们和教师们的生活，全是供给制，李达是当时文学院的总务科长，每一敲钟，大家即以小组为单位到伙房打饭，打一盆菜，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吃饭。因为进了城，干部们发点生活费，我是教员，领到了每月四十六元的津贴。这是我从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后，第一次领到这么多的津贴。而且吃穿还得自己解决。我因为长期没有花过钱，领到四十块钱都不知道该如何花。于是我先买饭票，把吃的解决了，再到市场上买了一套米黄色的单衣，带翻领的。我到张家口后，忽然对山西梆子发生了强烈的兴趣。当时张家口有两个有名的山西梆子戏班，一个是以筱桂桃、十一生、狮子黑为首的老班；一个是以郭兰英、牛桂英为首的青年班。我对这两个戏班的演出都感到兴趣，于是我星期日便花钱买票看两场山西梆子。下午一场，晚上一场。票价只一元边区票。剩下的钱就吃桃。张家口的桃相当不错，我的钱大约就是这么花光的。等我们撤离张家口时，我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了。好

在又恢复了供给制，也不用发愁。

学生们也都过的供给制生活。公家保证吃饭穿衣，一个月一元钱津贴，和我们过去的生活一样。学生们对这种革命的集体生活颇感兴趣。据我长期的观察，中国的革命知识青年，虽然多出身在小康之家甚至地主资产阶级家庭（包括海外归侨青年），但当他们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之后，生活上的艰难困苦，他们是毫不在意的，大多数是以苦为乐的。个别走掉的，当然也不排除。但绝大多数是很坚毅的。忧患和苦恼，不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的性格特征。他们从北京和天津到解放区去，都有过一番经历，都冒了一番风险，都是经过了长途跋涉和封锁线的。胆小的，意志薄弱些的，也就知难而退不去了。因此，当时到解放区去的青年学生，已经是经过一番考验的了。至少在当时，想到解放区去升官发财，求名求利的思想是没有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国民党的腐朽使进步青年对他们失去了希望。所以虽然日本投降了，建设新中国的希望，青年们都认识到是在解放区，在共产党身上。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，不少青年是被逼到解放区的。

别人的情况我知道得不详细，我的妻子王彤就是这样被逼进入解放区的。我的妻子王彤当属于城市贫民阶层。大学没毕业，就到一所小学去教书，挣一袋洋面养活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弟弟。她的姨表姐是戏剧家石梅，表姐夫是戏剧家石岚。蓝天野、杜澎都是她的表兄弟。石梅和石岚当时是北平的地下党员。石梅就介绍王彤（当时叫王敏荪）加入了地下组织中国共产党。在小学作一点宣传工作。

不知为什么，王敏荪这个小人物却叫国民党上了黑名单。是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报纸上通缉的180个共产党员之一。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真的共产党员，而王敏荪却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，这当然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。

一天清晨，报纸来了，石梅从报上首先看到了名单，吓了一

跳。因为王彤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头脑而又倔强的老太太，石梅怕这个名单叫王彤母亲看见，闹将起来，事情就只好收拾了。她于是赶忙到王彤家，王彤家也有报纸，幸好这个名单王彤的母亲尚未看。（王彤的母亲能够看红楼梦等小说）石梅急忙用手指把王彤的名字从报上挖掉。同时，安排王彤转移到解放区去。城工部的关系好办，但难的是通过封锁线，把人送出去。

谁来担当护送的任务呢，石梅的母亲，也就是王彤的三姨。石梅的母亲是王彤母亲的亲姐姐，是老三，王彤的母亲是老五。

王彤的三姨和她母亲不一样，没有文化，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她虽说在城里住了多年，仍然是一个农村老太太的风貌，性格开朗，敢作敢当。她并没有多少政治头脑，说着一口乡音很重的冀中话。她的女儿、女婿、儿子都是共产党员，她也不一定知道，但是她信赖女儿的话。于是石梅就请她的母亲化装成乡下老太太，把王彤化装成乡下小姑娘，坐上大车从青龙桥通过。这个老太太慨然应允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化起装来，说是母女俩回老家。这个老太太往车上一坐，旁边坐着一个乡下小姑娘，说是城里生活不下去了。和关卡说话都是老太太的事，王彤化装后也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儿，谁也猜不着，这个老太太竟是共产党的交通员。这次过青龙桥，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麻烦，问了问，看了看，就轻易地把他们的大车放过去了。过了青龙桥不远，就是我们的平西根据地，到了指定的地点，王彤去找刘仁同志的城工部，老太太又坐上大车大摇大摆地回到北京。王彤从不爱说自己的事，这些事都是这位开朗的老太太说着笑话告诉我的。

不过，王彤并没有上联大，因为她的母亲又哭又闹，家中生活也确实困难，城工部又把王彤送回了北京。做地下工作兼养家。好在风声已过，也没出什么事。

别的青年到解放区，都会有一些有趣的历程的。不过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，也就不以为然了。

学校当时的课程：当时是国内战争时期，用当时的话来说；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斗时期。学校是为政治服务的。所以当时学校的课程，是以转变学生的世界观为主要任务的。也就是说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，武装学生的头脑，使学生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。所以时事课，政治课占有绝对的优势。

共产党历来重视时事教育。在干部和学生中均是如此。在千变万化的国际国内的时事中，要善于分析形势。比如当时国民党号称有八百万军队，共产党只有一百万，连民兵算上大约有三百万。相比之下，敌强我弱，这就是形势的外观。从数量上看是这样的。若不分析，就会产生悲观情绪。中央首长讲话认为：国民党虽有八百万军队，其实并不可怕。因为（一）他们战线拉得很长，处处都要防守；（二）他们八年在峨嵋山观战，我们打了八年，他们的兵不如我们的兵，他们的指挥员不如我们的指挥员；（三）他们兵是强拉来的，我们的兵是翻身农民，素质不如我们。（四）他们有大城市，大城市好比是一个包袱，需要重兵把守，我们没有大城市，只有一个张家口，我们的兵少机动灵活，可随时集中。我们当时的策略不是夺取大城市，而是集中兵力消灭国民党的兵力，消灭一个连是一个连，消灭一个团是一个团。毛主席说：“与其伤其十指，不如断其一指。”就是要集全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而且国民党的士兵，多是贫苦农民，我们俘虏过来以后，做点政治工作，很快就成为我们的勇敢的战士。经过这么一分析，大家心明眼亮，把形势就看清楚了，信心就有了。

另外，就是基本的两门政治课教育：一门是社会发展史，讲从猿到人，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，讲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。基本是马克思、恩格斯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的通俗化，讲义也只是一个小册子。学习的方法是自学为主，加以辅导。学了 this 课程，就在学生的头脑中建立了唯物论的基本观

念，破除了学生头脑中的迷信观念，宗教观念，唯心观念等等。国民党说共产党洗脑筋，大约是指这个课程。大家一边自学，一边小组讨论，再请人作个报告，如此而已。因为他是真理，所以极容易为青年学生们所接受。另一门就是胡华教授在何干之教授的领导下，讲《中国革命史》。实际上是从鸦片战争讲起，讲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，讲共产党的纲领：推倒“三座大山”。学生的主要学习方法是小组边读边议，自由发言。然后全校学生找一个大礼堂听报告。各个学院的学生都来听，记笔记。大报告也不太多，我记得张如心同志讲过一两次，胡华讲过几次。成仿吾校长不担任讲课任务，所以我从未听过他的报告。课程少而精，学生以自学为主。我一九三九年到延安时，进的是冯文彬为校长、黄华同志为教务长的“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”，学得也是这一类课程，也是用的这个方法。我相信当时的抗大、陕公、女大，也是用的这个方法。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，华大（华北联大已改称华大）、革大、人大招收广大革命青年，经过短期训练，组成南下工作团支援南下大军。我当时是华大三部的班主任，所以我知道得比较详细。从一九三八年我党用这种课程和这种方法，只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，便使青年们掌握了一些革命的基本知识，然后就大胆地把他们送到战争中去锻炼，去受人民的培养。成仿吾校长是陕北公学的校长，中国人民大学是陕北公学的继续，一九六八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四十周年时，成校长曾说：“这种革命大学是我们党的创造，在教育史上，是空前的；他为革命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干部，也是绝后的，因为她是战争时期的学校。”

如今成仿吾校长已在八十四岁的高龄时故去了。他在战争时期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，是永远令人怀念的。

关于文艺学院的业务课：文艺学院的各个系，都是有其专业课程的。例如美术系的素描课，文学系的文学欣赏课，音乐系的作曲课，舞蹈系，由吴晓邦教授领着学生谢坤上练身段的课，戏

剧系呢？当时有一门重要的课程：即跳秧歌，就由我来教戏剧系的学生们跳秧歌舞的步伐。我那年 23 岁，这就是我从事戏剧教员生涯的开始。我当时心里很好笑：民间秧歌舞，居然上了大学的讲堂。我这个秧歌演员，居然成了大学的秧歌舞教员。我虽然会跳秧歌舞，但是我不会敲鼓。因为秧歌在当时占统治地位，张家口满街都会跳，学生中有会敲鼓的，就由学生们轮流敲锣鼓点子，我教学生们基本步伐。在延安时，从一九四二年以后，男女老少，军干百姓，全都会跳秧歌的，而且是“百花齐放”，各有各的风格，各有各的韵味。秧歌舞步伐有三种：就是陕北秧歌步伐、东北秧歌步伐和河北秧歌步伐，我教的是陕北秧歌步伐。因为这种步伐适合戏剧表演。跳秧歌舞步伐并不难学，难学的是民间的韵味。秧歌舞不是集体舞，更不是团体操，她讲究基本舞步统一下的自由动作，也就是说，节奏是统一的，动作是各异的。陕北人叫扭秧歌，秧歌演员以腰为轴扭动起来，再加上四肢的配合，可以在舞队中自由的跳和扭。我在延安时，跳了三年秧歌，觉得十分有趣。跳完一场下来，觉得浑身痛快。我当时想：秧歌舞是一种农民的艺术，农民长年在地里弓腰劳动一年，身体是僵硬的和弯曲的，春节时期，田里没活，跳起秧歌来，可以使全身松弛，把肌肉解放一下。但陕北秧歌多则一二百人，少则数十人，是一种群体艺术。因此，步伐就不能太复杂，也就是说凡是懂得基本步伐的男女老少，均可以参加舞队，服装要求鲜艳，化装可以各异。因此，各个演员舞蹈起来，都是神采飞扬，各显其技，活像一幅丰富多采的风俗画。步伐有轻盈的、有勇武的，表情有妩媚的、文静的、有悠然自得的、有剑拔弩张的。有老头、有老太太、有儿童。旧秧歌舞中有男女调情的表演，东北秧歌的调情味儿更浓，例如一男一女相爱，眉目传情，作相爱的手式，然后一个穿黑衣服的大肚子女人，拿两根洗衣服的棒捶，在他们中间猛一敲，把青年男女的调情冲散。这些东西，开初还有一点，后

来，大家认为不甚健康，就自动去掉了这些调情的动作。我教的是经过革新的秧歌舞。主要是为了配合秧歌剧的排演需要。因为从一九四二年以后，全解放区被秧歌这种艺术形式风靡了，戏剧系排演的，也是秧歌剧，如由作家（当时系里的学生）艾文会作的《担架》，就是一出秧歌剧，由戏剧系在张家口演出的。郭兰英演出的《王大妈赶集》，也是一出秧歌剧。著名导演孙维世同志导演的《一场虚惊》，仍然是一出秧歌剧。这出戏的主演是钱民同志，他是戏剧系一班的学生，他的秧歌舞，开初就是我教的。

在延安时，我虽说是一个有名的秧歌队的秧歌舞导演，我自然也喜爱跳秧歌舞，锣鼓一响，我的心就痒痒，就想下场去跳。但我自认为我的秧歌跳得不是最好的。我喜爱陕北农民跳秧歌的粗犷神情，但这种东西，知识分子学了以后，跳起来好象水墨画，纵横潇洒。我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。在知识分子出身的秧歌演员中，我喜欢王大化、凌子风、刘炽、马坚等同志的跳法。

王大化的跳法是不构成法，大手大脚，却带有妩媚。他跳来自由得体，却又合乎法度，给人以新鲜之感。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是东北人，他的东北秧歌跳得极好，他在秧歌中喜办老头儿，动作沉稳，神态坚毅，动作有雕塑感。他的步伐和动作节奏变化细腻，好看。音乐家刘炽是陕西人，是秧歌的活动分子，他跳起来具有更多的陕北味。吴坚同志是演员，他跳起来动作粗壮又有点天真。纪合群，河南人，喜欢在秧歌中扮演老太太，他这个老太太大约有点河南人的爽朗而又坚毅的性格，所以他在秧歌中一出现，人们就记住了他。

延安的新文艺工作者中的优秀秧歌演员甚多，如李群、黄淮、于兰等。当时都是秧歌队中的很美的少女形象。我就不一一例述了。

但他们都没有任教，于是我每天早上就在张家口的东山坡下

教授起秧歌来。

戏剧系的主任是著名导演舒强。他是南京人，原来是学画的，素描基础相当好。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演剧队，担任表演和导演工作。当时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《演员自我修养》，经章泯译成中文，卅年代在中国戏剧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，许多戏剧界的同志潜心钻研这本书，舒强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这是一本很厚的关于演员的表演艺术的书，他对于演员表演的内在技术，作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，并把他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来论述，使之成为一个体系。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三大表演体系之一。另外两个体系是中国戏曲的表演体系和德国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。在这三个表演体系中，目前只有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写出了系统的理论，并达到了美学的高度。这本书，是史坦尼总结了自己和俄国及西欧的著名演员，特别是话剧演员的表演经验而后写成的一本书。我是读过一两遍这本书的。我认为写的确实好，很严肃。但我只懂得了一部分。舒强同志是下过一番苦功夫来钻研这本书的，并在自己的表演实践中和导演实践中获得了成功。他在进入延安以前，是大后方的著名话剧演员之一。

舒强同志到延安时，还是一九四二年延安秧歌运动时期，他虽是话剧演员，但对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并没有跳秧歌，似乎也没有演秧歌剧，那是王大化、李波、贺敬之、马可、张水华、张鲁、刘炽等同志挑头干的。但是舒强同志在后期担任了大型歌剧《白毛女》的导演工作，并一举成名，成了解放区的著名导演之一。

《白毛女》实际上是延安三年秧歌运动在艺术上的一次总结。新参加鲁艺的这个阵容强大的创作集体只有两位：一位是导演者舒强，一位是演员王昆。舒强是从大后方来延安的，王昆原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，是从敌人后方来的，这是一次艺术上的大合作。《白毛女》的演出震动了延安城。贺敬之、马可、舒

强、王昆四个艺术家在这部戏中表现了自己的才华。其他的许多艺术家，如舞台设计家钟敬之等人，都为这部歌剧的成功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舒强同志为这部戏的导演者，在表演上也取得了成功。舒强是懂得美术的，他很注重每个剧中人的造型是角色性格不可缺少的部分。后来我在舒强同志处看见过《白毛女》人物的造型设计，有的草图是舒强同志本人勾画的。我以为这些角色的外部形象，已经刻划出了人物的性格。包括服饰和形态，已经可以看出每个人物的社会属性。这就是他这个导演的长处了，他有能力从外观上来塑造这个人物。舒强认为史氏的体系应当有充分的内在体验，并用外在形象把他表达出来。

这是舒强同志在这次导演工作中的成功之一，因为，《白毛女》中的每个人物形象性格都是鲜明的。

秧歌运动中的著名演员王大化，著名导演张水华，当时主要致力于向民间学习，把旧秧歌改造成新秧歌，从《兄妹开荒》到《惯匪周子山》都是王大化主演的。他的表演带有粗犷的、诗的、狂飙的气质。激动过千万人的心，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绪，卷起了一个大浪潮，这没有一点革命的粗犷气质是不成的。后来造成了一个群众的文艺运动就是证明。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啊！但是过了三年以后，人们就要求一些更细腻的艺术表现了。舒强的导演艺术适应了当时延安人的这种心理要求。并且鲁艺当时全力以赴，投入人力、物力和时间，使舒强有条件按照他的理想来导演这出戏。（因为这是为《七大》准备的节目）。

像舒强这样一位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导演，来作华北联大艺术学院戏剧系的主任，当然是很恰当的。我在延安时和舒强并不认识，我是到张家口戏剧系工作后才和他相识的。我和他共事五年之久，在他的领导下，学习了一些表演理论知识。

舒强在系里时，并不向系里讲课。他主张通过排演来逐渐的

使学生接触表演理论。

系里的另一名教师是著名导演凌子风。他也懂美术，善表演，是一位性格开朗多才多艺的艺术家。他长期在敌后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作表演工作。我在延安时，看过他和陈强、岳慎、郎中敏、李百万、郝汝惠主演的《把眼光放远一点》。此剧由胡丹沸编剧，牧虹导演，凌子风舞台设计。凌子风在这出戏中扮演一位耿直、坚毅、大公无私的敌后老人的艺术形象。我认为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流的演技之一。不过凌子风后来热心导演工作，目前是我国的著名电影导演之一，他的表演，则看到的人很少了，我是有幸看到过的。他的表演是在延安鲁艺的广场上演出的，我至今还念念不忘。这样一位好演员到戏剧系来当教师，我以为是很适当的。可惜他在戏剧系的时间不长，就被调回延安排电影去了。

石联星同志也是戏剧系的教员之一，她大约是我国红军时代留下的唯一的一位著名演员。她的艺术生活是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开始的。中间大约经历了不少苦难，联星是莲心的谐音，莲心苦的意思。她虽说经历了不少苦难，人却还是显得年青漂亮。白白的鹅蛋脸，高高的、挺直的身材，风度很从容大方。她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电影《赵一曼》的扮演。她的这个角色演得很成功，大约也只有像她这样身世的人才可能把这个角色演得那么好。这个角色演得既无脂粉气，又不显得生硬。观众信任这个表演。对于一个电影演员来说，一生能够创造出一二个受人信任的革命者的艺术形象来，也就可以了。也因为石联星的《赵一曼》表演的成功，似乎石联星就是赵一曼，为了保护赵一曼这个形象的完整性，石联星别的电影也不好演了。要不然，如若她在银幕上再一出现，观众会认为赵一曼来了。所以她上了一次银幕，就取得了成功，也因为取得了成功，就成为空前绝后的作品了。我以为这样好。现在观众只知道赵一曼，多数不知道石联星，就达到了这种效果。石联星在延安时与凌子风结婚，共同生活了卅九年，前

几天故去了。她可以说是苏区文艺的一个代表人物，她一直坚持表演达半个世纪。

戏剧系另一名教师是岳慎同志，她当时是沙可夫同志的爱人，在系里兼任支部书记。在敌后，她仍坚持表演。她在系里，把支部工作做得很好。戏剧系还有一位教师是女剧作家逯斐同志。她写过不少剧本，是诗人严辰同志的爱人，她也参加了表演。另外，从部队来的教师有洪涛、贺昭夫妇。系里还有一位助理员名叫王卓如，专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。这就是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戏剧系开办时的干部阵容。后来，戏剧家马雷和晏甬也在系里短期工作过，因为他们的所属单位在东北解放区，去东北的道路打通以后，他们就到东北去了。此时，戏剧系的学生有二三十人。

在张家口东山坡过了几个月的和平学习生活，大同战役发生了。领导上要戏剧系组成秧歌队上前线去慰问。于是由晏甬任秧歌队队长，我任副队长，岳慎为支部书记，把队伍拉到柴沟堡、阳高一带，参加华北地区最早期的土地改革。

二、到柴沟堡土地改革第一线经受锻炼

一九四六年阴历七月份，我和晏甬队长带着“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秧歌队”到了柴沟堡这座华北的小镇。这儿原来是铁路线，所以比较繁华，街道是土路，却很宽，有小洋房。中国的市镇，都和土地有密切的联系，地主往往住在镇上，而且往往兼营工商业。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的，但对于封建土地制度，是坚决要改革的。所以日本投降后，中央就抓紧办这件事，好象就是从阳高、柴沟堡一带开始，至少华北地区是从这儿开始点火的。我有幸参加这一早期的土地改革，实在有把他叙述一番的必要。我的所谓参加，实际上是参观，因为我尚未参加土改的领导工作。我认为这是生活中的最重要的生活。也是共产党多年来培养知识

分子革命化一条成功的经验，据我多年观察，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多半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，但是对于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却非常赞成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土改这样严重的阶级斗争，对阶级敌人是绝对保密的，可是对我们秧歌队却不保密。我们秧歌队从领导到学生，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不是少数。但因为他们已经是革命者了，所以共产党和贫农对他们都很信赖，而且让他们去放手发动群众，和贫农交朋友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是头一回。我当时参加共产党已经八年了，在延安就是五年。在延安时，政权建设实行的是三三制。土地革命的风暴已成过去，我见过不少延安地区的翻身农民，看到了他们新的气质——主人翁的气质。我也同这些翻身农民的孩子谈过话，当我问到这个孩子他们家有多少土地时，他开朗地告诉我，他们家打土豪，分田地时分了多少顷土地。可是他又向我声明，这其中没有分给他的土地，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出生。当我在陕北听这个孩子讲这些话时，我以为土地革命很神秘。凡是自己没有参加过的一些重大的事，往往都有一种神秘感。

这一次我在柴沟堡能够参加土地改革，很有兴趣。当时不叫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，初期是叫做“清算复仇”，这个名词只用了很短的时间，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又用了别的名词。

当时为什么叫“清算复仇”呢？大约是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。因为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、三三制的政权，其中包括开明地主，这个政策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。因为这个政策实行了八年之久，大家都习以为常，如今要解决土地问题，农民还很不习惯，所以“清算复仇”的含意，带有算剥削帐的内容。为的是启发贫苦农民看到地主阶级的剥削的阶级本质。自觉地起来，收回土地所有权，也就是“分土地”的意思。

当时柴沟堡的政权在共产党手巾，下一道命令土地就可以分